

U N I V E R S I T Y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大 学 之 思
— 译 丛 —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国大学的改革与阻力

市 场
观 念 的

刘东——主编

[美] 路易斯·梅南德——著

田径——译

Knowledge is social memory, a connection to the past; and it is social hope, an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The ability to create knowledge and put it to use is the adaptive characteristic of humans. It is how we reproduce ourselves as social beings and how we change—how we keep our feet on the ground and our heads in the cloud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观念的市场

美国大学的改革与阻力

刘东——主编

[美] 路易斯·梅南德——著

田径——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念的市场：美国大学的改革与阻力 / (美) 路易斯·梅南德著；田径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220-11179-2

I. ①观… II. ①路… ②田…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改革—研究—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0437 号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Louis Menan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Louis Menan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rst published as a Norton paperback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 [进] 21-2019-24

观念的市场：美国大学的改革与阻力

GUANNIAN DE SHICHANG : MEIGUO DAXUE DE GAIGE YU ZULI

[美] 路易斯·梅南德 著 田径 译

统 筹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封 龙
杨 立 邵显瞳
张 科
戴雨虹
吴 玥
李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hs@sina.com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140mm × 202mm
5.75
110 千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1179-2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序“大学之思”丛书

刘 东

这里集中收录的，多是美国同事们对于高等教育——当然主要是他们自己的高等教育——的批判性反思。

要说“挑剔”的话，这几乎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了。——尤其是在晚近的紧张竞争中，人们已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那种既生机勃勃又纪律严明的高等教育，几乎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比较优势了。而且，这样的优势竟还能长期地维持不坠，以至于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在几十年前讲的话，居然可以当作刚刚发表出来的新闻稿来读：

当外国经济竞争对手似乎在一个接一个的领域里超过我们的日子里，可以再次保证确信一点：美国毫无疑问地主宰世界的

一个重大的产业，那就是高等教育。世界上2/3到3/4的最好大学是在美国。这个事实是最近对美国高等教育展开批评的许多人所忽略的……我们经济中有哪个其他部分能作类似的说明？有棒球队、橄榄球队和篮球队——但名单也到此为止了。没有人会说今天的美国有2/3的全球最佳钢铁厂、汽车厂、芯片制造厂、银行或政府部门。我们处在高等教育质量表上的高端地位是非同一般的，它可能是一项特殊的国家资产，需要加以说明。^①

可即使如此，那些远在大洋彼岸的同事，还是对自己置身其中的高等学府，进行着毫不容情的且不稍间断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也并无丝毫矫情之嫌，相反倒是充满了由衷的愤怒，正如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所讲的：“高等教育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离不开它，也相信它的价值。当它带给我们失败，我们就变得失望；而当它开销太大，我们就变得愤怒。这种超乎寻常、至关重要的机构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逐渐成为今天这种状况的？”^②——于是也不待言，也正因为

① 转引自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第五版），高铨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② [美]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阎凤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页。

这种力道很大又接踵而至的批判，才给了我们这套丛书以持续不断的移译内容。

那么，他们都在“挑剔”或批判些什么呢？我在为“大学之忧”丛书所写的第二篇序文中，曾经随手进行过一些简单的枚举：

- 忧虑它的过度市场化和企业化，忧虑它的精神流失；
- 忧虑它的批量生产和形式主义，忧虑它的鼓励平庸；
- 忧虑它的集体腐败和拉帮结派，忧虑它的风格趋同；
- 忧虑时而出现弄虚作假和剽窃，忧虑它被外间污染；
- 忧虑它像飘蓬一样无根地变异，忧虑它丢失了传统；
- 忧虑它太贴向财大气粗的金主，忧虑它失去了独立；
- 忧虑它虚掷纳税人的辛勤血汗，忧虑它有违于公平……^①

所以，乍看虽然不无矛盾、细想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一方面，即使他们享有相对正常的学术秩序，即使他们的顶尖大学简直像“漂在钱海”里，可至少照身在其中的人们看来，这个“小

① 刘东：《再序“大学之忧”丛书》（修订稿），此文原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之忧”丛书的总序，之后我又作了修订，修订稿未刊。

世界”也并非什么“理想国”。恐怕正是因此，才至少在自己从事的人文学科，导致了曾经让我蹊跷不已的现象：“何以美国拥有那么多功力深厚的同行，但将其全部知识原创性叠加在一起，却远远及不上一个小小的巴黎？”^①可另一方面，又正因为从来都未曾对现状满足过，他们那些富于力道的批判话语，还是从效果上构成了持续激发的马刺，终究使那边的高校保住了总体的优势。——这种充满张力的辩证状态，用我以往发出的论说来讲正是：一方面，“知识群体突然兴奋地发现，大学这个他们最为熟悉的教育机构，正好提供了一个近在手边的文化案例，使自己可以充分发挥解析与批判的特长，从而不仅可以指望以自己的写作活动来改进身边的境遇，甚至还可以以此来报效大学所属的总体社会。”^②而另一方面，“同时也要平心地说一句，无论出现了多少问题，又正因为保持着这样的忧患，正因为可以公开发表这种忧思，正因为由此可以促进改革，他们的大学才保持着相对的优势，成为当代美国已经屈指可数的优势和骄傲之一。”^③

① 刘东：《社科院的自我理由》，《理论与心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② 刘东：《众声喧哗的大学论说》，《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和被损害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③ 刘东：《再序“大学之忧”丛书》（修订稿）。

实际上，即使美国只具备高等教育这一个优势，也足以盖过它许许多多的次要优势，从而在根本上创造着和保持着综合的国力，这才是美国大学最令人敬畏和值得学习的地方。三年前，我曾在“腾讯思享会”举办的授奖仪式上，历数过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种种忧虑，包括“生态恶化”、“创新不足”、“生育下滑”、“社会萎缩”和“文化垮塌”，等等，而“创新不足”又在其中排得相当靠前，因为它正在把中国拖向“中等收入”的无奈陷阱。——事实上，这一点又跟我们每天都在校园里发出的长吁短叹密切相关：“从我作为教授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教育还是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我相信我们的创新是不可指望的。我先教北大、后教清华，我的学生里边有很多状元但是他们不会创新，他们的博士论文主题都是老师我给的。一个博士论文题目都找不到，怎么可能做出能打败乔布斯的新成果？”^①

出于这样的忧虑，尽管我常常不赞成某些文人的“东施效颦”——他们往往弄得就连脸上的愤怒都必是“舶来”的——然而，一旦涉及整个文明的“创造性根源”，我们却又不能不对外部的话语有所触动与响应，或者说，是不能不去倾听那些作为激发动力的对于大学制度的批判反思，并且由此而对身边的问题发

① 刘东：《社会自治可驯化政治力》，《腾讯文化》，2015年11月26日。

出触类旁通的相应反思。无论如何，决不能再摆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架势，更不能只是琢磨怎么去钻现有制度的空子，所以它越是千疮百孔地糟透了，就反而越让自己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否则的话，那一切自夸就都不过是在妄发“虚火”，既徒然地招人嫉恨，又浅薄得令人喷饭；而我们正在快速崛起的父母之邦，则更匹配不上最起码的、至少与其体量相适应的“脑容量”，只剩下规模庞大的肉体身躯，像是尚未进化到“智人”阶段的远古猿人，或者说，是因为缺乏自身创化的前进动能，而像是步履蹒跚、摇摇欲倒的泥足巨人。

熟悉我的友人人都知道，这些都属于我长久的心结，所以也正是我一贯的坚持。而熟悉我的友人也都知，大概我这辈子最不缺乏的，就是这种“咬定青山”的耐力。正是为此，我已连续两次推动过这方面的丛书，也曾一而再地为它撰写过总序。如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事，由于也都是来自我所任教的学府，也都能分享自己的这份心情——想必主要还是分享了我的这份苦痛——也就在一年以前接过了这个选题，于是乎，眼下也就轮到我来第三次撰写这种总序了。

应当转念去想到，我们置身其中的高等学府，并不单纯只是用来安顿自己的机构，以至一旦有幸猫到了里边，就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研究，哪方面的合理性都敢于追问，几乎是“上穷碧落

下黄泉”，可偏偏就不去研究这个机构本身，更不去追问它的合理性。恰恰相反，这样的学术与教育机构，其本身也是脱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也有自己的来龙去脉、起承转合，因此也就绝不可能是天经地义、天然合理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只有通过不间断的检讨与反思，才有可能一步步地去改进和优化它，从而也让自己在其中发出的构思，都变得更加自如和富于活力，获得更上一层的解放与焕发。

与此同时，在这种潜心研读的过程中，正由于确然看到了来自西方本身的检讨，从而看出了即使是哈佛、耶鲁也并非无懈可击的，人们也就更容易从以往的盲从中解脱出来，尤其是，从当下对于“一流大学”的亦步亦趋的跟随中，幡然悔悟和恍然大悟地挣脱出来。事实上，针对这种不走脑子的盲目追随，自己在以往的论述中早已贬斥过了：“必须警惕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一旦谈论起大学，总是贪图省事不假思索地以不变应万变——误以为只要从西方文明的源头略加寻索，就准能在那里找到必然预制好的万应良药来；甚至，即使很显然当代西方本身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把那些理念弃而不用了，也仍然刻舟求剑地认为：只要能坚持表现得比西方还要西方，就一定会医治好当代中

国的大学。”^①

由此也便不在话下，用以取代这种盲目追随态度的，自当是我们本身的开动脑筋与独立思考，从而让我们对于中国大学的构想与改造，也变得更加自觉、清醒和胸有成竹，并让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些高等学府，也能逐渐配伍当代生活的紧迫要求。无论如何，总还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事，来加入对于大学本身的这番阅读与思考，从而从文化基因的隐秘深处，来激活整个中华民族的造血机制。——不管译介的工作将会多么艰涩与吃力，我们都愿把自己的这份额外辛劳，坚持不懈地奉献给有志于此的读者们！

2018年11月11日

写于清华学堂218室

① 刘东：《众声喧哗的大学论说》，《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和被损害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页。



前 言	001
第一章 通识教育的问题	010
第二章 人文学科改革	054
第三章 跨学科研究及其担忧	093
第四章 为什么大学教授的想法都相似?	130

CONTENTS
目 录

观念的市场：美国大学的
改革与阻力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结 论	164
致 谢	167
关于作者	171



前 言

知识是最重要的产业。其他任何产业的成功都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但知识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属性。追求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以及保护知识，都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活动。知识是集体记忆，它连接着过去；知识也是集体希望，代表着对未来的企盼。人类极强的适应性恰恰体现在创造知识并应用知识的能力上。这是人类社会属性的体现，也是人们变革的方式——有了知识，我们才能脚踏实地地着眼当下，又不失对未来的憧憬。

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通常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拥有更多知识，或更多获取知识途径的人，总比其他入更具优势。这说明知识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我们经常强调“知识本身的价值”，但是我们所学的一切知识都让自己对世界有不

同的认知，并且往往能让我们拥有更多优势。作为社会集体，美国人普遍坚信，知识的生产应当不受任何限制，每个人都有获取知识的权利。这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民主设想。我们认为，任何情况下，一旦涉及知识，我们拥有的知识总是越多越好。我们不认为有任何事物是不需要去了解的，或者有些事物只应该让一部分人掌握；正如我们同样不认为某些观点不需要表达，或有些人顽固不化到不具备投票资格。我们认为，只有更多地生产知识、表达观点，让更多人拥有知识，这样才能做出更好的决定。

因此，美国社会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资于特定机构，因为这些机构的宗旨都是生产和传播知识，即科研与教学。我们给这些机构各种特权和保护，因而，一旦怀疑它们并未按照设想的方式发展的话，我们立刻会感到焦虑，甚至是愤怒。人们对大学抱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民主也是如此）。教学是个异常复杂的过程，有时很难衡量教学是否成功，甚至连准确定义这个成功都很难。科研也是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很多看似好的理念或科学假设，最终都被证实并没有那么有价值。美国共有四千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超过一千八百万学生，以及一百多万教职员

工。^①很显然，我们不能期待所有学生都受到良好教育，也不能期待每个科研项目都值得去做。但是，我们愿意相信，这个庞大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制，身兼多种职能，一定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运作的，而非与我们作对。我们同样相信，在这个体制内，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教学与科研，并且体制本身并不排斥改革。

知识的发展状态与实际教学体系之间总是存在一定差距。知识的变更迭代总是早于现有的教学体系。然而，教育机构往往不愿意首先变革，教授们素来倾向于坚持学科保护主义，这类做法屡见不鲜。1908年，剑桥古典主义学者F·M·康福德（F. M. Cornford）在《学院现形记》（*Microcosmographia Academica*）一文中，不无讽刺地对年轻学者喊话，告诫他们教师管理的基本

① 本书中有关美国高等教育数据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与美国教育部联合发布的《美国教育统计年鉴》（*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http://nces.ed.gov>）；美国人口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发布的《美国统计摘要》（*U.S. Statistical Abstracts*）（<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以及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笔者在引用数据时，会给出数据来源，但一般没有列出链接，因为数据库更新后链接都会发生相应变化。

原则就是：“永远不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①1963年，时任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校长的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从学术界政治斗争中吸取教训，抱怨道：“大学对内部事务的保守程度令人惊讶，要知道大学里的每个人对其他所有事物都是持相当开放态度的。……有老师在南方因为支持民权运动被捕，但是只要涉及学校改革，却明显持双重标准，因为他们只维护先前教职工一致通过的决定，不愿再做任何改变。有些人恐怕并不适合做大学教师。”^②

大学教授们对体制改革非常抗拒。从旁人的角度看，他们非常可笑。但是对于学校管理者和大学校长来说，简直就是头痛，因为他们经常不得不苦心央求教授们接受学校的管理规定。为什么总有这么多来自教授们的阻力？本书随后会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在学术界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大学

① F.M.康福德（F. M. Cornford），《学院现形记：青年学术政治家指南（第四版）》（*Microcosmographia Academica: Being a Guide for the Young Academic Politician*, 1908; Cambridge: Bowes & Bowes, 1949, p.15）。见于戈登·强森（Gordon Johnson），《大学政治：F.M.康福德的剑桥时光以及他给青年学术政治家的建议》（*University Politics: F. M. Cornford's Cambridge and His Advice to the Young Academic Politici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99）。科尔相继出版了四个扩充版，最后一版于2001年出版。他在2003年去世。